

【1901-2000】

二十世紀的故事

1931年 的故事

姚政 / 蔚坤★主編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 T153295 *

20 世纪的故事

1931 年的故事

石朴 冬雨 编写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31 年的故事/石朴, 冬雨编写. -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1.3

(20 世纪的故事)

ISBN 7-5007-3436-0

I . 1... II . ①石 ... ②冬 ... III . 历史事件 - 世界 - 1931 - 少年读物 IV . K15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642 号



目 录

1	王明上台	(1)
2	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	(6)
3	胡汉民汤山被禁	(9)
4	韩复榘创建“北方模范省”	(15)
5	美国8名黑人少年被判决用电椅处死	(19)
6	日本“樱会”及三月事件的破产	(20)
7	肃“社党”事件和虎冈会议的召开	(23)
8	甘地出席圆桌会议	(27)
9	殷墟第四、五次发掘	(30)
10	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34)
11	中村事件	(40)
12	宁粤之争	(45)
13	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51)
14	万宝山惨案	(57)
15	石友三倒戈	(61)
16	中国发生特大水灾	(66)
17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出台	(70)
18	李济深被释	(74)
19	宋子文遭暗算	(77)
20	九月指示信的出台	(82)
21	阎锡山筹划东山再起	(87)
22	黄公略血洒六渡劫	(93)



23	9月18日晚10时20分	(99)
24	吉林、长春沦陷	(105)
25	张学良不负蒋氏“重托”	(109)
26	德国“哈尔茨堡阵线”的建立	(115)
27	日本犬养内阁上台	(117)
28	爱迪生去世	(120)
29	马占山嫩江桥抗战	(125)
30	国民党“三巨头”的最后一次聚首	(133)
3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138)
32	溥仪潜往东北	(143)
33	诗人徐志摩遇难	(150)
34	邓演达血洒金陵	(156)
35	德国两名化学家同获诺贝尔奖	(163)
36	孙科风光一时	(167)
37	锦州失陷	(172)
38	汪精卫再度与蒋介石合作	(176)
39	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183)
40	宁都起义	(189)
41	珍珠桥惨案	(195)
42	美国两人获1931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198)
43	王正廷放言遭殴打	(202)
44	梁漱溟在山东	(204)
45	毛泽东遭受打击	(208)



1

王明上台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秘密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原中共中央委员向忠发、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贺昌、任弼时、罗登贤、顾顺章、余飞、徐锡根、张金保、陈郁、温裕成、关向应等14人，原中央候补委员罗章龙、王克全、王凤飞、史文彬、徐兰芝、陈云、周秀珠、袁炳辉等8人，此外，还有全总党团、海总党团、铁总党团、江苏省省委、团中央、白区党的基层组织代表陈绍禹（王明）、博古、沈泽民、夏希（曦）、王稼祥、何孟雄、肖道德、陈原道、韩连会、徐畏三、柯庆施、顾作霖、沈先定、罗迈、袁乃祥等15人，共计37人，这次大会的策划者——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只开了一天，各种事情全由米夫一手包办。

由于米夫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会议，事前大家都不知道这是召开四中全会，从而达到了他借口没有安全保证，限制一天的会期来把王明扶植上台的目的。所以大会从头到尾都充满了激烈的争论。米夫在会前早就起草好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并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名义拟定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



委员和补选的中央委员的名单，从而使得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下子破格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且错误地打击了瞿秋白、何孟雄等一批党的优秀领导人。

向忠发向大会作了《中央政治局报告》，报告对立三路线的错误性质、历史根源、理论基础及造成的后果作了种种分析判断，指出，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反共产国际的，李立三敌视共产国际的态度是绝不容许的，三中全会的路线是调和路线，不能成为反对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这种调和主义的立场和对国际代表的“失敬”应由瞿秋白负责。接着，代表们就报告作了讨论发言，王明在发言中大力“推销”自己的《两条路线》意见书，他说，立三路线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未加以丝毫的揭破和打击”，没有对其实行“不调和的无情的斗争”；“在主要问题上继续着立三路线”，诸如否认在一省或几省内取得首先的胜利等。王明在这个发言中，还否认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帝国主义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占着统治和支配的地位”，中国是“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民族资本主义有相当畸型的发展，封建剥削已是“余孽”，中国革命的对象不仅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而且包括上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上中层及一切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别，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农、贫农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



的、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分的民主革命。这些言论都是典型的“左”倾政策，也难怪人们总是把王明同“左”倾冒险主义联系起来，而王明也成了“左”倾冒险主义的代名词，由此看来，这样称呼他一点都不冤枉。

王明在其发言中，还着重阐释了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他指出，在资本主义世界总危机日益剧烈的形势下，中国的国内形势是“新的革命运动的高潮日益增长”，“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者几个主要的省份”，“中国革命在全国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首先在一个或几个重要省区的胜利”，所以，要实行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在白色恐怖严重的国民党统治区域，要“加紧发动和领导工、农、兵劳苦群众的各种方式的斗争”，“在政治上、组织上、群众基础上真正准备和创造武装起义的一切必要前提”，红军要“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进而能够占领一个或者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

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作了总结发言，他用极其刻薄的语言攻击和嘲讽党内犯错误的同志。这非常不利于党的内部矛盾的处理，尤其是在当时革命形势那样严峻的情况下。从他的发言中，我们看到的并非是个有涵养、有气度、有修养的领导者，而是一个素质极其低劣的、不但是个很“出色”的恶意批评者、嘲讽家，而且还具有骂街泼妇“风采”和“魅力”。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能够领导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共产国际竟能派出如此“优



秀”、“高雅”的“人才”到中国来指导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尽管他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即使知道些也是错误的。他批评李立三反对共产国际，对共产国际“采用叛徒所用的言辞”，他说，共产国际之所以批评李立三，“并不是因为他是个热血的革命家，而是因为他是个盲动主义的英雄——一个披着冒险主义外套的颓丧的小资产阶级”，“是最无耻的机会主义与最卑鄙的悲观主义”。他批评中央政治局的同志特别是瞿秋白“一手拿着立三路线，一手拿着国际路线”，“一方面向共产国际鞠躬行礼，另一方面向立三主义鞠躬行礼。这样行鞠躬礼的时候，将国际路线推到立三路线后面去了”。米夫还称赞王明等读过几本马列著作、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不甚了解的人是“坚决的站在国际路线上面来反对立三路线的”，把王明等人树立为中国共产党内坚决执行国际路线的正确代表，为把他们送进高层领导机构做舆论宣传。米夫还提出要改造党的领导机关，坚决引进能执行国际路线的干部和工人到党的领导机构中。而王明等人是能把他们在莫斯科所学的东西应用出来，“坚决去执行国际路线的”。

会议在最后的选举时，可谓最“热闹”，各种争论和争执都达到了最高潮。米夫公布了他在会前拟定的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会议决定补选的中央委员和改选的中央政治局名单后，立刻遭到罗章龙、余飞、史文彬等代表的强烈反对，因为在这个名单中，王明、沈泽民等9人为新的中央委员候选人，王明



等5人为新的中央政治局候选人。接着，他们提出自己所认为的中央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和补选中央委员的名单。双方争执不下，只好举手表决。本来，许多代表不同意王明当选政治局委员，但米夫以其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并抬出“共产国际远东局”这顶大帽子，说他所公布的名单是远东局提出的，于是按照国际组织纪律，这份“国际名单”被表决通过。罗章龙表示不参加表决，要退出会场，被制止拉住，袁乃祥更是气得拍案咆哮，大闹会场，被通知退出。结果，六届四中全会的最后选举结果是王明、沈泽民、夏希、韩连会、沈先定、徐畏三、王尽仁、黄苏、曾炳春等9人当选为新的中央委员，王明、陈郁、任弼时、刘少奇、王克全等5人分别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李立三、瞿秋白、罗迈退出中央政治局。这样，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鼎力”相助下，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跃而成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又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了党的中央领导核心，并在实际上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王明上台可谓是历尽“磨难”，在一些代表的猛烈反对声中登上领导人之座，以后他便大力推行其“左”倾错误，给我们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了致命伤害。

由于四中全会上的激烈争论，会议时间又只有一天，米夫早已起草好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没来得及通过，只好选出王明等5人组成的“修改决议案委员会”对其进行修改，六届四中全会便就此结束。



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没有一点积极作用，它开创了共产国际代表粗暴干涉我们党内事务的恶劣先例，也首开了违背党章、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先例，它使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险些葬送了中国的革命事业。

2

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

1931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苏维埃区域中央局（即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宣告成立。同日，发布了《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一号——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的成立及其任务》通告指出：“中央为加强对苏区的领导和工作起见，在中央之下设立全国苏维埃区党的中央局（在政治上、组织上同南方局、长江局一样受中央政治局的指导）。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党的工作，将来苏维埃区扩大的区域，仍归中央局管理。现在，决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一人，CY（青年团）一人组织之。现已正式成立，开始工作。以后全国各苏区及红军党部（总前委取消）应直接受苏区中央局指导。但目前许多苏区尚未与中央区连接起来的，因



指导不便，暂受各地最高党部指导，将来打通之后，则全归苏区中央局指导。”这样，通告就对苏区中央局的人选、组成及其管辖范围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从而使各苏区和军队的党部改变了各行其是，不利于革命事业发展的情况，使之有了统一的领导和管理。

苏区中央局在人事安排上，由周恩来任书记，但由于他在上海党中央任组织部长、军委书记兼中央特别委员会负责人，一时之间不能到达中央苏区，故而由项英代理。《通告》中提到的任弼时、余飞当时也不能来苏区，由于交通阻隔，湘赣边特委也没能来人，因此中央局刚成立时，在苏区的中央局成员只有毛泽东、项英、朱德、曾山等四人。

通告中，提出了建立苏维埃区域的三个条件：一、土地革命的发展，加上已有广大群众的基础，或是已有这个条件能很快发展起来的区域；二、这个地方有强大红军组织；三、这个地域便利向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发展。根据这些条件，通告将全国苏维埃区域划分为六个，分别是：一、赣西南特区和湘鄂赣边区为苏维埃中心区，中央临时政府建在此区；二、湘鄂边苏维埃特区，包括鄂西、湘西北；三、鄂豫皖边特区，包括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四、赣闽皖边特区，包括赣东北、闽北、皖赣边；五、闽粤赣特区，包括闽西、广东东北、赣东南一部分；六、广西左右江苏维埃特区。这八个苏区都归苏区中央局领导。此后成立的鄂豫皖分局、湘鄂西分局，都是中央局的分局，但由于交通不方便，



联络也比较困难，所以直接归在上海的党中央领导。

通告还就巩固、发展苏区的路线、任务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包括，平均分配土地，建立苏区的广大群众基地；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统一全国红军的指挥，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建立和改造各级苏维埃政权机关，鼓励发动群众积极参加选举，使之成为真正的工农群众的政权；发展群众组织，成立苏区工人阶级工会、雇农工会及贫农团组织等，加强群众斗争的力量；加强肃反工作，但这一斗争要成为广大群众的斗争，绝不是按上级的命令去实行；利用敌人的弱点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消灭前来进攻的敌人，使他们的企图完全归于失败；举行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等。通告中的这些方针、任务的提出相对来说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其中也有“左”倾因素的影响，如它规定：苏区发展的总方向是向着南昌、长沙、武汉，依据军事政治环境，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等。

在苏区中央局成立的同一天，也宣告成立了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下设总政治部，主任是毛泽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人选包括全国各地的红军主要领导人。当时正值国民党军一、二次“围剿”之际，朱德负责红军总司令部的工作，毛泽东负责中央局军委总政治部工作，他们只能参加中央局的会议，不能常驻工作，在第二次反“围剿”时，中央局还是随军流动，成立的宣传部、组织部也没有人负责，直到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结束



后，中央局才离开军队，常驻瑞金，开始建立各部门的工作。

3

胡汉民汤山被禁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以请客为名，将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胡汉民骗到其所在的总司令部，尔后将胡软禁达8个半月之久。这就是名动一时的“胡汉民汤山被禁”。

蒋介石与胡汉民的矛盾由来已久，其源头可追溯到1927年他们第一次合作。当时，两人都想消灭共产党，都要镇压国民党政治上的反对派和各路纷争不断的新军阀，还都想成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最高领袖。那时的客观形势是蒋介石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缺少政治威望；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有较高的政治声望，但没有军事力量。合作后，两人互不相让，都想利用对方来达到自己做领袖的目的，这也就成为两人矛盾的根源。

怀有各自的目的，两个人的合作自然也就谈不上坦诚，而只能是互有保留。蒋介石担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后，掌握了国民政府的军事大权，野心日益膨胀，开始不断地向党务和政务伸手夺权。胡汉民由是对蒋更



胡汉民（1879—1936），广东番禺（今广州）人。1928年10月，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时，他任立法院院长。1930年2月，被蒋介石囚禁于南京郊外汤山（左为胡汉民）。



为不满，曾讥讽蒋：“其实甚么机关都可以不要，只要一个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就可以了。既简捷，又经济，对于减少目前的财政恐慌，大概也不无小补！”

蒋介石对胡汉民也是日益不满。本来，他与胡汉民合作的目的是壮大自己的声望，扩充自己的势力，因而，他决不会容忍胡汉民影响自己势力发展的行动。再说胡汉民自恃在国民党中的元老地位，经常与蒋介石发生争执，使蒋介石屡屡下不了台；蒋介石的亲信，也是屡屡遭到胡汉民的冷嘲热讽。

胡汉民与蒋介石的正面冲突，则发生在 1930 年 11 月 12 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三届四中全会上。早在 10 月份，蒋介石就提出要制定约法，梦想集党权、政权和军权于一身，作一个位居五院院长之上的总统。胡汉民不想让蒋介石实现独裁，更不想让蒋介石影响自己的权力，因而表示反对。这次会上的冲突就直接为约法制定与否的问题。胡汉民在大会的发言中不但对约法问题只字不提，而且还引用例子，说如果高明的飞行员不懂得开汽车，开汽车就会撞死好多人，指责蒋介石干预军事之外的党务政务工作。蒋介石不甘心就此失败，也不甘心白受胡汉民的攻击，就派人在 11 月 15 日向大会递交了一份提案，列举制定约法的种种理由，并对胡汉民攻击他的话进行驳斥。胡汉民对这个提案毫不理睬，根本就没交给会议讨论，惹得蒋介石的亲信吴稚晖、李石曾同胡汉民进行了激烈的争吵，大有些对骂的味道。

1931 年 2 月 24 日，蒋介石以谈约法问题为名，将



胡汉民请去，让张群等人劝说胡汉民不要再跟蒋介石闹，要他服从蒋介石的安排。胡汉民向来以清高自居，对这一套不但不理，反而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通，将蒋介石等人辩得哑口无言。蒋介石无法，只得假装要听从胡汉民的意见，说：“只好照胡先生的话去做，不要约法。”但他内心之中却在策划怎样除掉胡汉民了。

2月25日，胡汉民在接受《中央日报》的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自己反对制定约法，并将自己的理由公布于世。这不但公开表示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同蒋介石的对立，而且也对蒋介石的计划造成了冲击。这时，蒋介石就再也无法容忍了。于是，2月26日，蒋介石发出请柬，请胡汉民参加28日晚在总司令部举行的晚餐宴会，布置了扣押胡汉民的行动。

当时胡汉民并未察觉到自己已处险境，更未想到蒋介石不是请他去吃美酒佳肴，而是让他去赴鸿门宴。晚8点3刻，他到达总司令部。下车后，即为蒋介石所派的卫队包围；走进被领人的房间，则看到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坐在里边，门口被两个卫兵堵了起来。胡汉民见到情况有异，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但仍显得很镇定，不说话也不坐下，只是背着手在房子里走来走去。

待胡汉民坐下后，吴思豫交给他一封厚信，信中说：“近来反对政府，反对介石，无论在党务政治方面，处处与他为难”，并一一列举了他的“罪状”。看完信后，胡汉民气得浑身发抖，坚持要见蒋介石。蒋介石见推脱不过，只好硬着头皮去见他。两人见面后就展开了